

書 評

藍 美 華*

Johan Elverskog

Our Great Qing: The Mongols, Buddhism and the Stat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我們的大清：帝制中國晚期的蒙古人、佛教與國家）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 xvii+242 pages. ISBN-10: 0-8248-3021-0

閱讀本書的經驗是有些特別的：一開始覺得作者提出的許多論點乍看新穎，但似乎證據不足，想像力彷彿扮演了頗重要的角色（雖然想像力在歷史研究上是不可或缺的）；但隨著頁數的增加，筆者愈來愈能理解作者的想法，也就愈能接受作者的論點。看完全書後，覺得這是一本具有開創性、值得閱讀的好書，也很慶幸自己有機會讀到此書，從中獲得不少啟發。

本書作者目前為南衛理公會大學（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宗教學系（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副教授，2000年獲得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分校（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中亞研究（Central Eurasian Studies）博士。近年來除本書外，還出版了 *Uygur Buddhist Literature*（回鶻佛教文獻）（Turnhout: Brepols Publishers,

收稿日期：2008年10月13日，通過刊登日期：2008年11月10日。

* 作者係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Lan Mei-hua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997) 、*The Jewel Translucent Sutra: Altan Khan and the Mongol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寶貝透明經典：俺答汗與十六世紀的蒙古人)¹ (Leiden,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2003) 、*The Pearl Rosary: Mongol Historiography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Ordos* (珍珠數珠：十九世紀初期鄂爾多斯的蒙古史學)² (Bloomington: The Mongolia Society, 2007) 等書，目前研究重點為內亞 (Inner Asia) 佛教史、蒙古思想史以及清代文化政治 (cultural politics)。本書是在其博士論文 “Buddhism, History & Power: The Jewel Translucent Sutra and the Formation of Mongol Identity” (佛教、歷史與權力：俺答汗傳與蒙古認同的形成) 基礎上改寫而成。

進行蒙古的相關研究，利用蒙文材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游牧民族的文字傳統是不發達的，因此，早期的蒙古人除了《蒙古秘史》³外，並未留下太多蒙文材料，研究者必須大量依賴與蒙古互動的定居社會 (中國、波斯、羅馬、印度、俄羅斯等) 的文字材料。蒙古一直要到十六世紀廣泛接受佛教後，才開始有較多的文字材料出現，而這些材料或多或少都帶有佛教色彩。因此，本書作者利用蒙文材料研究 1500 至 1900 年間的蒙古，佛教不可避免會是研究的重點之一。研究十六世紀之後的蒙古，雖然有了較多的蒙文材料，但大部分的研究者受限於自身蒙文能力或蒙文材料的取得，仍多依賴非蒙文材料，無法從土著觀點切入進行研究。難能可貴的是，本書作者蒙文有一定造詣，苦心蒐集並使用大量蒙文材料，包括許多之前學者未曾好好利

1 此書是《俺答汗傳》的英譯本，原蒙文書名為 *Erdeni tunumal neretü sudur orosiba*，意為「名為寶貝透明的史傳」，內容實即俺答汗傳記，故書名一般直接中譯為《俺答汗傳》，英譯本副標題是譯者自行添加。*sudur* 一字可譯為 (1) 經、經卷、經典、經書，(2) 史冊、史書、史籍，(3) 傳記、演義，作者將其英譯為 *sutra*，顯然採用第一組譯詞，但筆者認為譯作史書或傳記應更合原意。*tunumal* 意為 (1) 沉積的、沉澱的，(2) 透明的、清澈的、明亮的、晴朗的，作者英譯為 *translucent* (半透明)，似乎仍稍有落差。之後筆者仍將採用《俺答汗傳》作為書名，因為這已是通用的中譯書名。

2 此書亦有譯為「珍珠念珠」者，原蒙文書名為 *Subud erike*，英譯本副標題是譯者自行添加。

3 《蒙古秘史》原有的蒙文版本並未發現，留下的僅是漢字音譯版本，但經學者多年努力，目前已回譯出數種蒙文版本，不同版本間除了個別字彙或句子外，內容基本上是一致的。

用過的材料，藉此直接讓蒙古人說話，告訴讀者「何謂蒙古人，何謂佛教徒，以及這些與清國（the Qing state）的關係」（頁7）。本書主要在談蒙古——尤其是內蒙古——認同的轉變。作者透過蒙文文本的解讀分析，指出蒙古人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看待自己以及取得政治正當性的方式確有不同，而這些變化與清朝對蒙古的政策，以及滿蒙共同信仰的佛教在其間扮演的角色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

根據草原上的生存法則，一個能幹的領袖在成功時可將各部族聚集在其麾下，形成游牧國家，但當他失敗或死亡時這些部族則會棄之而去。在滿人收服蒙古人之前，蒙古人早有部族與國家之分。國家可以改變或消失，但蒙古人認同的部族卻會繼續存在。作者正確地指出了這個區分的重要性，並以 *törö* (state) 與 *ulus* (community) 兩字來表示國家以及國家內的各部族群體，只可惜他將 *ulus* 譯成 *community* 並不完全貼切。⁴ 由於這個制度的存在，在十七世紀初期蒙古社會動盪之際，蒙古部族是要效忠原來的領袖，還是加入滿人建立的新國家，或是兩邊都不加入，維持自治，均符合既有的認同體系（頁26-27）。但也因為加入滿人建立的新國家對蒙古人而言並不奇怪，所以後者久久無法真正融入清朝體制，直到滿人設立蒙旗（*qosirū*, banner）上百年後，透過滿洲皇帝對各旗蒙古王公的任命與賞賜（作者所謂的 *ornamentalism*）以及世系的紀錄，才終於將蒙古原有對 *ulus* 的認同轉至 *qosirū*，二者畫上等號，蒙旗成為蒙古人認同的對象；而 *ulus* 一字的意義也有了變化，轉而用於形容蒙古民族這個聯合體（頁24、31、72-73）。到了十九世紀，蒙古人撰寫的歷史中不再長篇描述其遠古的祖源世系，而僅僅記錄所屬蒙旗的世系與歷史（頁152）。

4 根據符拉基米爾佐夫（B. Я. Vladimirtsov）的說法，古代蒙古人的一切氏族、氏族分支和部落聯合體，就其隸屬於首領、汗、那顏（貴族）、太師、把阿禿兒（英雄）等等的觀點看來，都叫做兀魯思（*ulus*）。參見（蘇）B. Я. 符拉基米爾佐夫著，劉榮峻譯，《蒙古社會制度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頁155。札奇斯欽與保羅海爾將 *ulus* 譯為 *nation* 應是更為恰當，參見 Sechin Jagchid and Paul Hyer, *Mongolia's Culture and Societ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79), pp. 260-261。F. D. Lessing 主編的蒙英字典中，*ulus* 被譯成 *people, nation; country, state; empire; dynasty* 等字。*Ulus* 一字難譯是由於它在不同時期指涉的意義會有所轉變，但作者將其譯為 *community* 是相當罕見，也不甚貼切。

作者指出，蒙古人的政治正當性並非單獨建立在佛法（Dharma）上，而是建立在佛法與騰格里（*tngri*）⁵的雙重庇護上，而且後者的重要性高於前者（頁46-47）。這個說法主要是想跳脫長期以來存在於學界的「二教」（*qoyar yosu*）模式⁶的限制（頁44），是有其意義的。作者又表示，蒙古人對騰格里的崇拜是以祭拜成吉思汗的方式來具體呈現，因為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之父，是最早受到騰格里祝福而得以統治天下的人（頁48）。這個具有創意的騰格里／成吉思汗論點僅是建立在薩囊徹辰所著《蒙古源流》一書中關於林沁濟農（Erinchen Jinong）即位時的描述（頁48），並不是建立在堅實的證據上；而且作者也坦白，有關早期成吉思汗崇拜與統治正當性關係的相關資料非常稀少（頁49）；但這個說法仍然相當有意思，值得注意。

成吉思汗是建立蒙古帝國的英雄，元朝瓦解後有所作為的蒙古領袖如達延汗、林丹汗、俺答汗（Altan Khan）等均將其視為模範，蒙古人崇拜成吉思汗是天經地義的事；而佛教在蒙地廣泛流傳，成為蒙古人虔誠信仰的對象後，佛法自然也成為蒙古人認同的要素之一。如果不能得到成吉思汗的庇護和佛法的祝福，任何蒙古政治人物都無法取得正當性，滿人想獲得蒙古人的順服，也不能例外。作者透過有系統的論證讓讀者了解，滿人在早期對蒙關係中的確在不影響蒙古人原有認同的情況下，成功地將蒙古納入清帝國的領土之內；其後順治皇帝藉著提升藏傳佛教中格魯派的地位，讓蒙古人的信仰從原本多元、帶有蒙古特色的佛教轉化成一派獨大；滿洲皇帝持續十六世紀以來蒙古政治人物宣揚佛教的傳統，使得藏傳佛教影響力持續擴大，甚至最後在蒙古人寫的歷史中，成吉思汗的蒙古性格愈來愈弱，佛教性格日增，竟轉為佛教神祇（頁115）。滿人在與蒙古人的互動中將清帝國塑造成佛教國家，讓佛教成為凝聚蒙古人對清帝國認同的重要力量，使得蒙古人在自我認

5 *Tngri*中譯為「天」，英譯多為Heaven，但作者認為譯作God更貼切，頁183，註10。

6 這是十六世紀在蒙古人興起的藏傳佛教政治觀，認為在國政與宗教兩個層面，宗教要從佛法之道，而國政要從俗世之道，國政由君主管理，宗教由喇嘛上師管理，兩者地位平等，互相依賴。何啟龍認為，所謂元朝實行「政教二途」乃是十六世紀蒙古人的臆測與建構，其目的只是方便政治領導者如俺答汗等以宣揚佛教來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已，事實上元朝並未獨尊佛教，帝師與皇帝地位同等更是絕無可能。參見何啟龍，〈蒙元和滿清的「傳國玉璽」神話——兼論佛教「二教之門」的虛構歷史〉，《新史學》19.1(2008.3): 29-32, 36。

同上真正成爲清帝國的一部分，願意爲同樣信仰佛法的「我們的大清」(*Manu Yeke Cing / Our Great Qing*) 犧牲奉獻，對抗基督徒與反清的穆斯林，在清朝瓦解後，還曾爲了恢復大清王朝而努力。

之前學界長期存在一種論點，認爲滿人利用藏傳佛教來統治蒙古人，這種看法也普遍存在於蒙古人心中，但作者對此論點表示反對，認爲這過於誇大藏傳佛教扮演的角色，是有問題的(頁14-16)，尤其是在早期滿蒙關係中，蒙古傳統 *törö / ulus* 系統才是滿人得以順利入主蒙古的主要原因。事實上，甘德星在他的博士論文中早就指出，滿人並無意圖利用佛教拉攏蒙古人，他們信仰佛教是因本身接受佛法；努爾哈赤在1621年就已信奉藏傳佛教，而信仰漢地佛教則又更早。⁷ 此外，很多蒙古人——尤其是在內蒙古東部——在清朝形成時期根本還不是佛教徒，當然也就不可能有所謂滿人利用佛教拉攏蒙古人之事。⁸ 這類討論對作者的研究而言應該是很重要的，但作者並未花太大功夫對此加以釐清或表明立場，相當可惜。雖然作者對滿人利用藏傳佛教統治蒙古人的說法有時略顯遲疑，不敢全然否定(頁93)，但基本上他是反對的，因爲在不同時期，藏傳佛教的影響力度是有差別的。筆者認爲，作者應該更勇敢清楚地闡釋此一差別，不該有所退縮，因爲滿人的對蒙政策以及蒙古人的認同對象，原本就是在二者長期互動中協商調適而來，並非靜止不變的，滿人的政策會有調整，而蒙古人的自我認同也會轉變。

本書最大的貢獻在於作者大量利用了明清時期蒙古人自己寫的材料，讓讀者可以知道蒙古方面的想法。從作者陸續翻譯出版了《俺答汗傳》與《珍

7 Tak-Sing Kam, "Manchu-Tibet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A Reappraisal,"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4.

8 Tak-Sing Kam, "The dGe-lugs-pa Breakthrough: The Uluk Darxan Nangsu Lama's Mission to the Manchu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4.2(2000): 161-176. 甘德星指出，滿人取得統治蒙古的正當性根本與佛教無關，而是因爲皇太極取得了察哈爾林丹汗的傳國玉璽。得此玉璽後，皇太極才建國號改元稱帝，而蒙古人也認定皇太極已得昊天之洪福而投向滿洲。參見甘德星，〈「正統」之源：滿族入關前之王權思想與蒙藏轉輪王觀念之關係考辨〉，汪榮祖、林冠群主編，《民族認同與文化融合》(嘉義：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頁152-159。甘德星的學生何啟龍在他的近作中基本上繼承了甘德星的見解，進一步闡明了蒙元時期藏傳佛教與統治的正當性全無關係。參見何啟龍，「蒙元可汗的合法性：王權與神權」(南京：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7)。

珠數珠》兩本專書（撰寫博士論文的附帶成果！）也可看出他在蒙文材料上用力之深。除了這兩種材料外，他還對不同時期（滿蒙建立關係之前、滿蒙關係前期、滿蒙關係後期）各種蒙文材料中，蒙古作者對本身歷史以及滿蒙關係的描寫仔細進行了文本分析，發現隨著佛教影響力在蒙古地區的強化，蒙古作者對人事的詮釋以及論述的重點均有所改變，從中亦可看出蒙古人認同的轉變。可惜的是，作者在使用清代蒙古人的作品時，並未討論這些作品的內容是否能完全呈現蒙古人的真正想法，亦或部分作品是在清廷審查壓力下的產物，畢竟清朝並無完全的言論自由。如果能對這些作品的作者及寫作、出版背景有進一步的研究，應可做出更正確的詮釋。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牢記，十六世紀之後蒙古人的作品具有濃厚佛教色彩，描述的內容和真正的史實往往是兩回事。此外，還須順帶一提的是，本書作者主要是利用蒙文材料，幾乎沒用到滿漢文材料，這在研究的完整性上當然是受到限制的。不過，作者明白指出，這個研究不把重點放在中心的行動與技巧，而在邊緣的人實際上如何理解或實踐來自中心的這些活動（頁7），或許這讓迴避使用滿漢文材料有了理由。

蒙古人信奉的佛教雖是來自西藏，但俺答汗與其後人以及林丹汗均致力於將藏傳佛教在地化，也有了一些成績。然而，滿人成功將蒙古納入清帝國後，清廷在藏傳佛教各派中刻意抬舉格魯派，達賴喇嘛的影響力增大，蒙古人也逐漸受到影響，佛教蒙古化的行動中斷，滿人版本的佛教最後成了蒙古人的信奉對象，作者甚至將之稱為蒙古人對佛教的「第三度皈依」（頁126）。這個獨創的說法，或許稍嫌誇張，但在作者仔細分析下，應該也是可以博得讀者一哂。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格魯派在順治皇帝和第五輩達賴喇嘛的共同努力下，擊敗其他宗派，彷彿成了藏傳佛教的唯一代表，但其他宗派並未在蒙古地區消失，依然存活至今。他們如何在格魯派的強大壓力下保存一縷血脈，似乎也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作者在研究此課題之初，就決心利用蒙文史料，讓蒙古人發聲。但弔詭的是，讀完這本書後發現，在滿蒙關係中，滿人似乎依舊扮演了相對主動的角色，而蒙古人在多數情況中仍是較為被動，只能跟著滿人設計的腳步前進，在後者精緻的政策下最終成為滿洲皇帝忠誠的追隨者，為防衛大清帝國而盡心盡力。在*törö / ulus*的制度下，或許大多數蒙古人自始至終都不認為

滿人的統治帶有任何殖民色彩，滿洲皇帝就如同成吉思汗或佛教系統中的諸佛一般，獲有統治的正當性，是得到騰格里與佛法的祝福的，只要滿人能帶給他們安全與所需的資源，蒙古人也就沒有理由加以反對。蒙古人的被動中似乎也隱含了某種程度的主動性。

滿蒙三百年的關係十分複雜，學者可以從很多角度進行研究，但要做出好的研究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單單利用漢文材料固然也能進行研究，但研究課題肯定受到限制。企圖更深入探究滿蒙關係，不但需要對滿蒙語文有一定的解讀能力，也必須了解蒙古身為游牧民族的邏輯與制度，滿人作為外族少數統治一個多民族龐大帝國的心態與政策，西藏與藏傳佛教扮演的角色，漢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對滿人統治的想法以及各民族間彼此的互動關係，更得涉獵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相關研究課題。本書既是蒙古政治史、蒙古思想史、佛教史、清史的研究，又涉及國家權力、文化政治、民族認同等論述，牽涉的面向廣闊，值得探討的主題相當豐富，作者能將如此複雜的滿蒙互動關係及其因果清楚理出脈絡，提出創新合理的解釋，值得讚佩鼓勵。